

冒充“三甲医院”医生、忽悠患者买没用的药 “网络医托”到底有何“话术”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周科

“名医”的“三甲医院”网站排在搜索的前列,吸引患者点击咨询。该公司与各大搜索引擎合作,每月推广费几十万元。

“话术”诱骗患者。在山水公司设立的咨询部,一群仅有中专以下学历、没有行医资质的人员冒充医生和医生助理,按照专门编印的“话术”,将主动咨询的患者诱骗至医院接受治疗。

“此案大多数患者都是通过百度搜索找到该犯罪团伙承包的三家医院。”龙岗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李刚说,其宣传的医院号称“三甲”等级,实际上是二级医院;网站上推出“名医、专家”,实际接诊的只是医院的主治医师;咨询员均不具备行医资质,却在以医生的名义导诊。

夸大病情诱导就医,有的治疗收费是正规医院10倍左右

记者调查发现,该犯罪团伙成员利用搜索引擎诱导患者后,通过夸大病情、多开药物等方式进行敛财。

——夸大病情。“你的病情较严重,必须马上到院治疗”“你的病情正处于复发高峰期,不来医院就诊后果自负”“我们医院是治疗你这种病的权威医院,有名医和专家接诊”……

李刚说,涉案嫌疑人常用这些“话术”进行诱骗,自2017年9月成立至案发,山水公司通过“网络医托”推广到医院就医的人数高达5914人,营业收入29166842元。每骗一个患者就有100元奖励,同时还按每名患者治疗费的1%提成。

——多开药物。当患者依约到医院就诊,医生会按照固定治疗模板让他们先做260元的三项检查项目,再依次推出住院治疗、仪器治疗、药物治疗三种方案。“仪器治疗的价格是正规医院的10倍左右,药物治疗一般会开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的药物,并开出许多对病情毫无作用的其他药物。”李刚说,还有专人带患者去窗口缴费,美其名曰“五星级服务”。

受害人胡先生说,他的儿子花了两万多元在长沙长峰医院看头痛病,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加重了。

——“热心”跟踪。如果患者在约定时间没来看病,医院科室会主动联系,“热心”跟踪未就诊原因。当患者就诊后,“医生助理”每隔两三天就进行电话回访,一旦有患者因各种原因不到医院进行复诊,“医生助理”就会虚夸病情恐吓他们。

办案民警介绍,该犯罪团伙承包的精神科科室、医疗费用、医务人员等,全部由所承包医院统一管理,医院每月与山水公司结算。结算方法是先扣除科室外包费、医生账上工资等,然后把剩下的钱转到山水公司账上,再由公司向科室人员发放额外工资。医院账目上医生每月5000元工资,而山水公司每月额外向其支付4万至5万元。

严查科室违规外包,多部门合作打击“网络医托”

此案并非孤例,近年来多地发生类似医疗领域诈骗案件。在深圳,仅2018年就已破获多起涉医诈骗案,查封黑诊所10余家。

记者梳理发现,这些案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法分子勾结医院,利用线上或线下“医托”行骗。由于利益驱使,一些医院的医生、护士、导诊甚至是后勤人员也参与其中。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运清表示,我国社会办医发展迅速,个别民营医院热衷于各种营销套路,要加强监管,严肃查处科室外包、夸大病情、高额收费等行为。

李刚表示,随着监管部门对线下“医托”加强打击力度,“医托”有往线上发展的趋势,出现进阶版的“网络医托”。要加强互联网信息监测,对网上有关“医托”的有害信息链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打击“网络医托”应加强多部门合作联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对违规网站等相关方追究连带责任,提高其违法成本。

广东胜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吕胜柱表示,“医托”主要钻了医患信息不对称的空子,患者要改变“病急乱投医”的心态,尤其是对于一些难以启齿的隐疾,不能盲目借助网络寻医问药,要到正规医院就诊。(新华社深圳5月13日电)



华屋「红军村」的幸福蜕变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影报道

▲这是华屋村新貌。

华屋村位于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是远近闻名的“红军村”。苏区时期,当时只有43户人家的华屋村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红军,“17棵松”的故事更让无数后人动容;村里的17个年轻后生出发参加红军前,栽下17棵松树,和家人约定“见松如见人”,不幸的是17位华氏子弟都壮烈牺牲在长征途中,他们手植的松树被后人命名为“信念树”。

多年来,由于资源匮乏,耕地贫瘠,劳动力短缺等原因,华屋贫困程度深,许多百姓住在低矮破旧、透风漏雨的土坯房内,灶台连着卧室,厕所挨着水缸,用的是低压电,走的是土泥路。

2012年,随着《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华屋人开始逐渐摆脱贫困。伴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华屋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230元增长到如今的11300元,危旧土坯房得到改造,大棚水果蔬菜、红色旅游蓬勃兴起。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从一排排破旧的土坯房,到如今一幢幢焕然一新的客家小楼,华屋百姓步入幸福美好新生活。



▼这是华屋村遗留下来的土坯房。

今日关注

调侃汶川地震,相声搞笑不能没边界

汶川大地震11周年纪念日,德云社人气明星张云雷的一段相声视频,犯了众怒。视频中,张云雷抖包袱称“大姐嫁唐山,二姐嫁汶川,三姐嫁玉树,我仨姐姐多有造化啊……”随后,张云雷通过微博道歉,称表演内容很欠考虑,向全体社会大众致歉。

在汶川大地震纪念日,看到这样的表演视频,把生命的巨大伤痛当成开玩笑的梗,可想而知民愤之大。没心没肺地拿国难开玩笑,虽然没有特别过分地调侃,显然还是严重伤害了深情缅怀遇难同胞的人们。经查询,调侃汶川地震的视频,其实是2018年12月31日,张云雷在青岛跨年表演上的节目。视频为何会在纪念日当天曝出,我们不得而知;背

后若是存在人为操作,这种借机搞事的行为,无疑也很可耻。

相声的艺术特点,要能逗得观众发笑,不可能像演讲似的一本正经。尤其是在市场环境不佳,要能存活下来,免不了投观众所好,说些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东西。在小剧场那样的特定环境里该怎么说,上央视那种大舞台上又该怎么说,其实多数演员都是分得很清楚的。只不过,网络视频抹平了这样的差距,把某些原本只适合小剧场表演的东西,人为放大到剧场之外,接受审阅,因而成倍放大了其中的不合理性。

小布什在老布什的葬礼上“爆料”,说他父亲有一个电子邮件群,专门用于朋友之间分享最新的笑话。他对笑话有一个

很典型的乔治·布什笑话质量评分系统:能得到十分罕见的7分和8分的笑话,大多数都是带黄色的。小布什的这段悼词并没有什么不合适,反而还原了父亲作为普通人的真实一面,显得更为亲切。真实的世界就是如此,哪怕贵为一国总统,也终究不过是个普通人。只要没有恶意,有些玩笑很难分出个丑寅卯,大俗大雅。

相声是民间的艺术,要的就是观众一个乐呵,因此不可能端着,必须走进观众生活,在诞生之初,甚至不乏低俗。屎尿屁,荤段子,下三流,脏臭话,都有。但这绝不是说,曾经怎样,今后也必须怎样。幽默终究还是有高级与低级之分的,随着人们鉴赏水平越来越高,文艺表演的尺度也该与时俱进地更新。同样一

个玩笑,过去开可能没什么,但在今天继续开,可能就很不合适了。文明在不断进步,相声搞笑的边界也得不断调整。就事论事,虽是“旧事重提”,只要张云雷的表演视频是真的,无论是不是在纪念日当天表演,也无论是不是基于主观恶意,拿国难开玩笑,都是突破文明底线的恶俗行为。那一点都不好笑,只会令人反感。生活中,开玩笑开过了头,很可能会让好朋友大打出手;相声是公开的表演,更得有一个清晰的标准,想好了再去说。否则,再好的包袱,也得憋回去,说出来就是越界,就是伤害,就活该接受舆论的质疑和公众的声讨。

当然,文明的社会应该是宽容的,动辄上纲上线也毫无必要。若是任何人在

任何时候说过的任何话,都有可能将在未来某个特定的日子,被别人拿来当靶子,刻意引发网上舆情,那种互挖祖坟互相审查互为攻击的场景,绝不符合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张云雷的这段相声视频,若是表演后就被质疑,当属很正常的舆论监督;可挑这么个特别的日子,掐头去尾专门呈现几句话,味道终究有点怪异。

所有的自由,都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之上。艺术创作同样如此,所以学艺先学德,做戏先做人。文艺表演的边界在哪里,何谓幽默何谓低俗,哪些包袱能抖哪些不能,那是相声演员要拿一辈子去修炼的艺德。作为社会公众,我们或许不必上纲上线;但是作为公众人物,人为艺心中当有底线。(舒圣祥)

外卖健康证乱象,监管不能当“甩手掌柜”

对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要求送餐人员须持健康证上岗。但对于外卖送餐人员是否必须持有健康证,目前法规仍未完全统一。原食药监总局于2017年底颁布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中,仅要求对送餐人员进行食品安全培训和管理。

由于没有具有法律效率的健康证管理要求,目前外卖健康证管理仍然是处于散兵游勇状态。所以一直以来,外卖平台招募外卖人员,只要是全能跑腿送外卖的都行,对于外卖健康证根本不当一回事,所以就有了外卖健康证乱象的尴尬。但是应该看到,外卖健康证乱象,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健康威胁,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网络平台是传统外卖行业与时俱进,寻求突破与裂变,的必由路径。但随着电子商务的异军突起,网络订餐已经成为颇受消费者欢迎的快餐模式,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外卖订餐网站下单,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各式美食,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与之相比,监管显然还跟不上互联网+

的奔跑步伐。如今是“想卖我就卖”的乱象丛生。

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然而时下网络平台电商不顾食品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到处招兵买马,无限度扩张,对从业人员把关不严,把没有健康证的人员随便收入麾下,给消费者送餐上门。给消费者舌尖安全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遏制外卖健康证乱象,确保消费者

健康安全,有关监管部门不能当“甩手掌柜”,而是积极有为。一方面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跟进,依法规范化管理,提高外卖人员的准入门槛,“外卖健康证”应成为外卖从业人员的必备,杜绝没有健康证的外卖人员的从业资格;一方面加强行业规范化管理监督,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外卖平台应该为从业人员健康把关,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无证上岗,实行零容忍,一经发现依法严厉处罚。确保群众吃上放心安全的网上订餐,确保消费者舌尖上安全放心。(左崇年)

健康安全,有关监管部门不能当“甩手掌柜”,而是积极有为。一方面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跟进,依法规范化管理,提高外卖人员的准入门槛,“外卖健康证”应成为外卖从业人员的必备,杜绝没有健康证的外卖人员的从业资格;一方面加强行业规范化管理监督,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外卖平台应该为从业人员健康把关,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无证上岗,实行零容忍,一经发现依法严厉处罚。确保群众吃上放心安全的网上订餐,确保消费者舌尖上安全放心。(左崇年)

竟有人相信砸烂微信群就可以不加班了

信群”这种平台,认为一个个工作群模糊了公私权界,模糊了8小时内外的休息时间,使工作幽灵一直在身边如影随形地游荡,在卧室、在厨房、在休假期间、在开车时游荡,方便着眼里写满食人欲望的老板们剥夺着员工的闲暇。人们天真地以为,微信工作群是万恶之源,只要干掉微信群,下班后就可以不被没完没了的工作骚扰了,“奴役”,形成工作对休息时间冠冕堂皇的侵犯。这是一个

典型的倒果为因谬误,没有互联网,就没有加班了?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先有劳动者的休息权利缺乏保障,加班成为企业文化,“5+2”“白+黑”当成励志典型表彰,工作与休息缺乏不可逾越的权界,然后才有微信工作群的困扰。也就是说,微信工作群只是劳动者权利被侵犯的一种症状。就像生病发烧,体表温度的升高只是病的一种表征。不寻找根本原因,不去碰公私权界这个核心问题,不寻求在法律框架内捍卫休息权利,而绕微信工作群做文章,毫无意义。

先有劳动者权利被侵犯,加班成为职场惯例,公私时间没有权界,然后才有微信工作群的困扰。休息权利被公司和法律肆意侵犯的语境下,社交媒体不断被强势的单位文化所征用。当一种社交

工具被广泛接受,会迅速被单位征用为“劳动工具”,“霸占”为“方便工作交流”的工作平台,伊妹儿、QQ、MSN、微信,家庭电脑、手机、笔记本,强势的单位文化可以随意征用任何技术工具,借此侵入私域。实际上,微信工作群这种玩意儿一开始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工作负担”的面目出现的,打电话要说的事,微信群里说一下就就行了;下班后得开个会要说的话,微信群里开会说下就行了;现实把许多人召集到一起很麻烦,建个工作群很方便。

说句很多人可能不爱听的话,在加班缺乏约束、休息时间被工作随意侵犯的情况下,微信工作群的相对危害、对私人时间的侵犯可能是最小的。要不,下班开会再走?要不,不在微信工作群讨论工作了,都回到线下去开会,线上能

解决的,都移到线下?我当然也反对8小时时间被侵占,可是,当这种侵占变得不可避免,法律权利缺乏应有保障之时,把微信工作群当成万恶之源去清理,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8小时内外公私无界,任何一种社交工具都会异化为“工作群”,信不?

天下苦“工作群”久矣,苦加班久矣,苦5+2久矣,却很少看到有人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去用诉讼界定公私权界,甚至连“下班后微信群禁发工作消息”这样的文章都不敢转到朋友圈,怕被领导修理。——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在加班问题上较真,没有人把《劳动法》当回事,而都寄望于包青天式的保护,寄望于“上面出个规定管管”,寄望于砸烂工作群,寄望于搭别人维权的便车,是没有用的。(曹林)

直抒己见

为什么这么多“清华”幼儿园

清华大学这两天又上热搜,原因“亮了”:起诉多个“清华幼儿园”商标侵权。名校崇拜由来已久,在少年人上升路经更为有限的地区,这种崇拜也更加泛众化。因为离之越远,它们就越不像一个实体和机构,而更像一种教育图腾。从商标法的视角下再打量这种景观——遍布城乡角落的名校招牌如此坦然地存在着,据媒体搜索,全国范围内带有“清华”字样的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多达20余万家,仅“清华幼儿园”就上百家,事情就变得刺目了。但“清华幼儿园”不是能直通清华大学的幼儿园,却是基本的事实。(刘文嘉)

“市政工程欠款十年”是一个恶劣的示范

山东滨州的王先生向媒体反映,他父亲带着村里的乡亲在当地干了多年建筑工程。2002年以来,从滨州黄河河务局下属企业黄河建筑安装工程处承揽了多项政府市政工程,十几年来却要不回血汗钱。如今,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三年了,还有150多万工程款被拖欠着。媒体曝光后,相信相关部门会迅速介入调查,工程款讨回又重新有了希望。但事件处理不能仅限于此,还应依法依规追究,让有关责任人付出代价。如此行为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必须严惩不贷。(陈广江)

电动车充电安全难题亟待破解

5月5日,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附近一村民自建房发生火灾,截至当日13时,事故已致5人死亡、38人受伤。起火部位位于1层楼梯间,燃烧物为电动车。有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7年,全国共报因电动自行车电池充电引发的火灾1万余起,较前5年增长33.3%。我们在讨论电动车充电起火案件时,是否能够换个思路,试着从解决充电渠道的源头问题上讨论?有关部门是否也能够从城市规划等层面上,将电动车充电问题纳入入社会议题来想办法解决呢?毕竟,汽车有加油站,电动汽车有什么不能想办法也享受一下公共服务呢?(陈城)